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二篇)

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提 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公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当30日晚上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不料有一陌生人突然闯进会场,随之大批巡捕搜查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后在嘉兴南湖完成了最后的议程。经过叶永烈先生的寻访,经资深的老上海、前法租界巡捕房警官薛畔莘确认,这个闯入者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这是程亲口对薛所言。程子卿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后来担任过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督察长,为巡捕房的得力干将。但他也曾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保护宋庆龄、邓演达和共产党员等。上海解放后,在宋庆龄等的关心下,程子卿免于逮捕,安享晚年,直到1961年去世。

关键词: 程子卿;中共“一大”;上海;巡捕房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1)02-0103-06

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达摄氏37度。^①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举行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闯入了会场,他张目四探,借口找人,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建立的进程。

这个闯进李公馆的中国密探是谁?经考证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那么程子卿是怎么会闯入“一大”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密探的?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荣的把兄弟?程子卿的人生结局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究梳理,以求给出答案。

一、密探闯入共产党成立会场

多位“一大”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而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2人。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的: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最早回忆该事件的是陈公博,他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用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此次我在上海,最使我觉得滑稽的,就是被法国巡捕误认我是日本社会党。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两个从前外国教授。我们见面之后,因为两年不见,少不得要攀荆道故,听夕往来,因此之故,便动了几个侦探先生的疑心,时时在暗里踪迹。有一天夜里,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谈了片刻,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我因为天热的缘故,不愿匆忙便走,还和我的朋友谈谈广州的情形,和上海的近状;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

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篋,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②

后来,陈公博在写回忆录时,再度说到此事,他在《寒风集》中云:

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我代表马令(原文如此)和吴庭

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国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③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李达回忆说:

马林即席讲话……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的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④

张国焘在晚年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大约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⑤

北京代表刘仁静的回忆是:

有一次还没有到开会的时候,我们正在闲谈,突然有一个人开帘子朝里面一望,我们在里面的人立即问他“你找谁?”他说“我找错了。”而后就走了。张国焘说“这个是包打听,我们赶快散会。”李汉俊马上把共产党的文件烧掉了。过了不久,法租界的巡捕就来进行了搜查。^⑥

陈潭秋的回忆是这样的:

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下,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当时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房子,对不起,说毕扬长下楼而去。离李汉俊寓所的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只有李汉俊与陈公博未走。^⑦

广东代表包惠僧回忆道:

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一个陌生人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揭开,一只脚踏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说一句:“对不起我走错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都说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即刻解散。”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⑧

1957年,包惠僧撰文详细再述事件经过:

第四天的会,还是晚饭后开始。马林、李克诺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是准时到会。开会后不到半个钟

点,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用可疑的目光对着我们扫射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坐在当街的窗户下,目光正对着那个可疑的人,他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改地点开会。”于是我们立刻解散了。^⑨

尽管患腹泻的周佛海没有出席那晚上的会议,但他在《往矣集》中有篇《扶桑笈影溯当年》,也曾回忆到当晚之事:

每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开到第四晚上,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陌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马林机警,便道“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⑩

董必武的回忆是:

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⑪

综合以上各位代表的说法,梳理如下表。

“一大”代表关于闯入者的回忆

回忆人	回忆时间	开会地点	闯入者穿着	闯入者神情	闯入时间
陈潭秋	1936年	楼上厢房里	穿长衫的人	獐头鼠目	下午八点钟晚饭后
周佛海	1942年	楼上		一个陌生的人	晚上
陈公博	1944年	楼上			
包惠僧	1953年	楼上	穿灰色竹布长褂的一个陌生人		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
李达	1955年			张目四看	
董必武	1971年				
张国焘	1971年	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		窥探了一下	晚七时
刘仁静	1979年			有一个人开帘子朝里面一望	

关于会议场所,各位代表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取得了一致。关于时间晚上似也相同,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歧,可以肯定在晚上8时,会议开始后不久。而闯入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

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主要是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这个“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个人。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快快而去。^③

二、不速之客是程子卿的确认过程

那么,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的呢?也就是说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的呢?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才揭开了这一谜底。叶回忆道:

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他一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他知道我的来意,热情地予以接待。

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九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④

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者对薛畊莘进行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2003年,我作为央视、上视联合拍摄的纪录片《海上沉浮》的历史顾问,曾带摄制组去岳阳路薛畊莘先生寓所采访,他当时已99岁,也曾说起程子卿夜闯“一大”会场事,以后又多次拜访请教。^⑤1929年薛畊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先充便衣警务人员,后担任政治处社会科翻译,这以后在程子卿的领导下工作。也应该就在这一期间,程子卿将闯入共产党会场的秘密告诉了薛畊莘。

如果叶永烈是第一个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时间应在1991年。^⑥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当时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成立开会的呢?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个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其行踪处于严

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的身份公开活动。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⑦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会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⑧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⑨所以7月23日当晚,马林来到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租界当局的警觉。董必武后来回忆说:

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⑩

陈公博在1924年也曾指出:

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⑪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上海的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⑫

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而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比较特别:

1921年7月1日前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上(今淡水路)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司法警察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够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1日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原文Duan Qisai,根据后文解释应该是段祺瑞——译者注),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根据这些情况,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Chazal)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⑬

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闯入会场的插曲载入史册,说的就是“一个穿青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打断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

议程!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制止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而事后人们津津乐道那个穿长褂的密探,我是十分了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终年身穿旧式的长褂,夏天单穿棉布长衫,冬天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②

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值得庆幸的是,程子卿还是嫩了些,他的便衣探访,马上引起了马林、张国焘等的高度警觉而立即休会转移,才使得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躲过一劫。

顺便说一句,程子卿侦查后,应该是直接向总监费沃利报告,张国焘说带队的是总巡,如果属实的话,就应是费沃利。费沃利带了一队巡捕密探搜查李公馆。这时程子卿是否重返李公馆会场,“一大”代表们并没有回忆,可惜的是,程自己也没有回忆。也许他没有再进入,也许他在暗中窥视。

三、程子卿的生平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2年3月3日^③,初中毕业,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比较高了,而并非只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在镇江的米店当学徒,米店里天天不断地拎米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在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根据叶永烈的叙述,薛畊莘曾出示过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以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④他在那里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的黄金荣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⑤程子卿那时还不到20岁,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⑥到上海后,程子卿也曾进入过“法书斋堂”学习。^⑦

程子卿何时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做密探,肯定在黄金荣之后,而黄金荣是1892年进入巡捕房的^⑧,此后,黄金荣将结拜弟兄也拉进了巡捕房。

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那年他才26岁。程子卿尽管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其官运比把兄黄金荣要好,正如薛畊莘所言,在巡捕房,“黄金荣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包打听’,比程子卿还小。”^⑨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曾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且他比黄金荣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所以他在简历中书入国民党的地点: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⑩政治组专门负责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深得萨而礼的倚重。”^⑪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1929年升格为政事治安处(俗称政治处)^⑫,萨而礼担任处长。程子卿受到重用,成为萨氏的左膀右臂;30年代相继担任政事治安处主任、督察长。薛畊莘回忆,与黄金荣关

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政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在龙华召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且早于政变前两个月,就已预测中国政局将有重大变化,即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及国共两党行将濒临破裂,并为事实所证明,由此受到法国外交部的重视和赞赏。“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⑬

程子卿与黄金荣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此点也为黄金荣的管家所证实。^⑭由于程子卿这个小兄弟与黄金荣岁数相差较大,因此黄门内部多将程子卿归在黄门弟子之中。老上海黄振世指出“黄在法捕房所收的门生,除金九龄、陈三霖、程子卿等少数几个人外,后来比较接近的门生,大都是他成为大流氓头子后所收。”^⑮程子卿还将巡捕房的晚辈薛畊莘介绍给黄金荣,1939年薛畊莘升为督察长后,黄金荣每周至少一次邀请他去民国路口的逍遥池浴室洗澡。“黄叫茶房头阿五,特备亨牌雪茄烟,茄立克香烟及特制的中西各点招待。”^⑯薛曾自己承认,此后黄金荣、杜月笙还每月给他500元车马铜钿。也就是在30年代末,程子卿对薛畊莘谈了1921年往李公馆搜查的事情。^⑰这件事薛畊莘一直牢记在心。

20年代末,程子卿与杨景德女士结为连理。杨又名桂芳,1897年1月17日生,有小学5年级的文化程度。程杨两人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也许是与法国人比较接近的缘故吧。他们共育有两女一子。长女程采贞1931年1月29日生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直担任医生;儿子程鸿钧1932年7月18日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曾为企业职员、政府办事员等。次女程梅英1934年12月1日生于上海,也受到良好的教育。

就在生下次女的那一年,程子卿搬迁到薛华立路和平里(今建国中路173弄),那一带是中产阶级的居住区,程子卿一直住到离开人世。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参与侦破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案;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⑱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 and 做事”^⑲,他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幸未受伤。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均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当时程子卿家中人口达10人。

笔者手头有一张程子卿警察证(CARTE DE POLICE)的影印件,从中可以解读出一些历史的信息。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供职于法国领事警察局(POLICE CONSULAIRE FRANÇAIS),即法租界巡捕房,警号为631号,等级为侦探督察长(Inspecteur Principal détective),编号为501号。发证时间为1943年。就在那一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了法租界。

由此可见,程子卿并没有在1939年退休,程子卿自称“在法捕房35年”^②。法租界被收回后,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那年他的薪水为1050元。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3等警监,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是年12月1日,又转任第六督察区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③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薛耕莘则认为,程子卿并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军官,没有拿过什么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意识到可能被捕,便去求助于宋庆龄。于是,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知情者薛耕莘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④“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⑤此后他赋闲在家,所以解放后登记的职业为“年老无业”。但生活颇不错,50年代,他家里仍雇有3名佣人,顾汉菊(1929年生,江苏启东人)、孙粉章(1936年生,江苏泰兴人)和朱阿花(1905年生,浙江绍兴人);还有一位奶妈王宝英,直到1954年4月才离开程家。程子卿虽没有职业,但其儿女均学有所长,成为医生、技术人员,孙辈环绕膝下,安享天伦之乐。1961年9月27日,^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⑦

解放初,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产党成立会场、破坏中共创建进程的“不速之客”,否则也许会留下更多的一手资料。不过对于程子卿来说,人们不知道他就是破坏中共“一大”会议的密探,是值得庆幸的;否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晚年也许就不可能善终了。

注 释:

①《申报》1921年7月31日。

②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J].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③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大”前后(二),1980,第421页,下略。

④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G].“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李达还有的回忆内容与此相似(见《李达同志回忆》,《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印,第25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G].转引自《“一大”前后》(二),第179页。

⑥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G].“一大”前后(二),第213页。1957年4月22日,访问刘仁静时,刘氏有基本相同的回忆。《访问刘仁静的报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访问记录。《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印,第301页。

⑦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G].“一大”前后(二),第288页。

⑧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G].“一大”前后(二),第305页。包氏在1978年还有个回忆,与上述回忆内容相仿,见《“一大”前后》(二),第377页。

⑨包惠僧(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J].新观察,1957,(13)。

⑩⑪周佛海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G].“一大”前后(二),第492页、第368页。

⑫董必武同志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G].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印,第133页。

⑬如果陈公博记录准确的话,当时法租界警务处总监(即总巡)为费沃利(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⑭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J].新青年,第9卷第3号;陈公博《寒风集》(1944年),转引自《“一大”前后》(二),第422页。

⑮⑯叶永烈.名人历史现场[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第202页。

⑰薛耕莘字仰衡,法文名约瑟夫·薛,晚年因“耕”字较为生僻,因此户籍中作薛耕莘。上海人,1904年10月22日生于上海,研究生学历。1930年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后升任政治处主任、督察长。1951年被捕,1975年特赦,1981年平反并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2008年9月9日病逝,享年104岁(上海市公安局天平路派出所《薛耕莘户籍档案》)。

⑱叶永烈.红色的起点[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⑲荷兰外交部保存着马林的档案,如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封信时候,马林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上海,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详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⑳后来巡捕误以为陈公博是日本共产党,大约也是因为日本情报的缘故吧。

㉑《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9日)》,收于《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B—1。转引自【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㉒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㉓《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民国日报》1921年7月31日。

㉔②⑤JOSEPH SHIEN avec MARIE HOLZMAN, DANS LE JARDIN DES AVENTURIERS. EDITION DU SEUIL. P69—P70.

㉕一些论著称程子卿生于1885年,有误。

㉖叶永烈.名人历史现场[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㉗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G].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严格而言,当时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到20年代他才拜张锦湖为老头子,加入了青帮。参见苏智良、陈丽菲《海上枭雄黄金荣》,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

㉘薛耕莘这样写应有根据,但目前还不清楚程子卿何时正式加入青帮。

㉙③上海市档案馆藏《程子卿档案》。

㉚详见苏智良、陈丽菲.海上枭雄黄金荣[M].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

㉛薛耕莘.法国巡捕房三把手谈自己的巡捕经历[J].纵横,2009年第2期。

㉜上海市档案馆藏《程子卿档案》。

㉝③⑤④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一)[J].史林,2000,(3)。

㉞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61。

㉟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G].旧上海的帮会,第148页。

㊱黄振世口述、何国涛整理.我所知道的黄金荣[G].旧上海的帮会,第185页;另见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G]. 旧上海的帮会,第148页。

③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G]. 旧上海的帮会,第91页。

④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上海政治》(二),《史林》2001年第1期。

⑤上海市公安局打浦桥派出所《程子卿户籍档案》。

⑥有些论著称程子卿死于1956年(如叶永烈《名人历史现场》,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实际程死于1961年。

⑦程子卿的夫人杨景德于1980年1月7日因肺炎而病故,终年83岁。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项项目“中共

建党与上海社会”(10JJDJNJD189)、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苏智良(1956—)浙江嵊州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社会史和中日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王旭东;校对:晨曦

论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经验

袁礼华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 历史学系,南昌 330031)

提 要: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反腐败取得实效的基本经验包括:一、确立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二、坚持组织原则,反腐败以工农检察机关直接指导的群众团体为中坚力量;三、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发挥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强大威力;四、强化制度规范,确保群众运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五、维护法律的权威地位,群众运动通过法律的途径惩治腐败;六、服务中心工作,群众运动反腐败与促进革命战争发展相结合。

关 键 词: 中央苏区;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反腐败斗争;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1)02-0108-0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扫旧政权的腐败吏治,开创了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一代新风。但由于新生的红色政权脱胎于有着漫长历史的封建社会,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侵蚀,致使苏维埃政府内部不同程度地产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为了杜绝腐败,保持政府的清正廉洁,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运动,卓有成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第232期)}，“苏区干部好作风”成为人民群众广为传颂的佳话。为借鉴历史的经验和启迪,以利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本文拟对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反腐败取得实效的基本经验试作以下概括和论述。

一、确立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

苏维埃的一切权力属于工农群众,群众监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标志和具体体现。《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指出“苏维埃是一种最德谟克拉西的政权机关,她不尽尽(仅仅:笔者注)最接近劳苦群众,而与群众关系最密切,而且最易受群众的监督”。^{[2](4页)}毛泽东主席强调“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收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2](309页)}苏维埃民主政治中这种群众的监督主体地

位,也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此,时刻保持并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群众的监督下,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治国原则。

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中,为了将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充分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通令、训令和指示,号召、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1932年2月1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第3号通令,严正指出“过去各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许多浪费,随意滥用,是苏维埃政权下所绝对不允许的。”^{[1](第10期)}。3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号召工农群众检举揭发,“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1](第12期)}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第2号训令,以“来一个大大的检举运动”为号召,大张旗鼓地动员人民群众检举“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1](第45期)}。1934年1月4日,为引导群众更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在总结前期查处腐败案件经验的基础上,要求人们:一要提高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检举检查的面要广,“不仅是财政部人员可能发生贪污浪费现象,如内务部、裁判部、军事部、别的军事机关、国民经济部、政治保卫局、总务处,以及一切经手收钱用钱的机关,都有贪污